



1949—1978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发展概要

●主 编 朱祥丰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发展概要

(1949—1978)

主 编 朱祥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 新登字 1 号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概要

(1949—1978)

Dangde Luxan fangzhen Zengche fazhangaiyao

主编：朱祥丰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沈阳市东风印刷厂印刷

字数：200,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9.125

印数：1—6,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连凯

版式设计：任和

封面设计：冯守哲

责任校对：李秀芝

ISBN 7—5382—02376-9-D·457

定价：5.10元

序 言

尚 文

党的历史一再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只有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其发展过程，对于我们加深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概要》一书，系统地、完整地介绍了我党在近七十年的历史过程中，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是如何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概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展的历史渊源，了解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客观必然性和具体内容，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之间的区别和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得和失，从而使我们从中认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帮助我们加深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理论的认识，提高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都是十分有益的。

目 录

第一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1
第二编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8
第三编	总路线	42
一、	过渡时期总路线	42
二、	党的八大路线	49
三、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57
第四编	纲领	63
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63
二、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68
第五编	方针	74
一、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 内外交流”的方针	74
二、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	81
三、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86
四、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94
五、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105
六、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113
七、	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方针	123
八、	健全民主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方针	130
九、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137
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48

第一编 由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转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终结，从此，我国社会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时期。这次转变，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实现了这次伟大的转变。这次转变的胜利实现，使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结束了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剥削社会和少数剥削者统治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摆脱了我国长期贫穷落后的状态，为生产的迅速发展，国家的独立富强，社会的不断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我党的一贯指导思想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旗帜

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大会宣言提出：第一步“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第二步“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7—78页）这次大会所阐明的主张和制定的纲领，成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基础。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在前进中曾遇到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我党在同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

1923年，国共两党合作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他们背离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在阶级敌人进攻面前，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致使大革命遭到了失败。1927年4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这次教训：由于“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因而遭到了失败。会议指出：“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

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8—39页）

在纠正右倾投降主义以后，“左”倾盲动主义开始膨胀。

1927年11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所谓“无间断的革命”。他们认为“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他们主张“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9、427页）因此，他们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力量又受到了严重损失。为了纠正革命中的错误倾向，1928年6月，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批判了“左”倾错误思想。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

些问题。”大会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的主张，确定为两个阶段。并且指出，“中国革命底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底直接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69页）“六大”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扭转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危险形势。11月，毛泽东发表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他根据武装割据的新形势，进一步发展了“六大”的正确思想。他说：“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全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根据变化了的政治形势和党内存在革命的急性病的特点，阐明了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长期性。文章指出：“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文中批评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的观点，指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毛泽东选集》

第1卷、第160—161页)在此之后,于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文章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1939年正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抗日战争出现转机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在军事上发动进攻的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攻势。为了从理论上武装人民,彻底粉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把革命推向前进,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他从分析近代中国性质入手,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方面作了科学的阐述,系统完整地论述了革命转变的理论。文章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

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文章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651页）1940年1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批判了“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文章指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他说：革命“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他说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8、679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表明了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理

论的成熟。1945年6月，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写进了党章。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61—462页）至此，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作为全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正式写进了党的章程当中，成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和行动的法规。

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政策

1949年，全国解放已经胜利在望，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已经成为现实。为了胜利地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3月，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的伟大号召。大会还适时地作出了理论上的阐述和政策上的规定，以确保转变的胜利实现。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

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但鉴于当时全国有三亿多人口是新解放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武装匪徒还没有肃清，城市和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尚未开展。因此，这一时期，一方面同资产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遗留任务，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做出了正确处理。

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就谈不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国在民主革命阶段，在已经解放了的地区，已经建立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这些政权虽然是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就其阶级性质，它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立即在各地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国政权。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强调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当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是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批判了“依靠贫民群众”和“依靠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1428、1433页）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

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

革命的转变，是由武装夺取政权向掌握和运用政权进行经济建设的转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他要求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他说：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能在生产方面做出成绩，并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6—1428页）

旧中国的经济是半殖民地的畸形的经济，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是十分严重的，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说：“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对于城乡私人资本主义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

的积极性，但不是不受限制任其泛滥，而是“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他说：“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的两个基本政策。”对于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1—1433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原则上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又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采取谨慎地稳步地前进的方针，这些都保证了转变的胜利实现。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两个文件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确立，成为建立和行使国家政权的指导原则。《共同纲领》提出：“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文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

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历史参考资料》第290—292页）遵照《共同纲领》的原则，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行使国家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进一步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巩固和发展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于1950年6月，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打击的矛头对准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和地主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要认真地做好团结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也就是把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放在第一位，只有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土地改革，恢复了国民经济，才能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才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他说：“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决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

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24页）党的三中全会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先后缓急，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方法解决，避免全国“一刀切”或“四面出击”的策略，使革命的转变得以顺利进行。

三、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实现 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最终是通过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随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日趋尖锐。为了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党于1953年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这条总路线，是我国在过渡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纲领。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转